

冷戰、革新與南向： 臺灣跨國資本在越南的路徑依存

張書銘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龔宜君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

摘 要

當前臺灣跨國資本在越南的經濟成就，乃是與 1960-1970 年代冷戰體制的美援架構以及南越特殊的地方脈絡有關。本文所指跨國資本的路徑依存，指的是冷戰體制下臺越關係的歷史遺緒，以及臺灣僑務政策的治理思維與南越華人的經濟地位。南越華人的經濟作用有三個意涵：一是南部異於北部的政治經濟結構，形塑南越華人具有開放性的世界主義性格；二是西貢華人於南越時期掌握多數工商業經濟；三是革新後華人工作處成功地橋接與海外華人資本的聯繫。

關鍵詞：臺灣、越南、冷戰、革新、南向政策

壹、前言

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時常會以東亞發展經驗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 作為理論典範，是以區域國家間的產品週期特性與產業技術轉移為發展模式。此發展模式得以成功的關鍵在於跨國網絡的建立，因為資本積累和外資建立的連結產生外溢效果，使發展

落後的本地公司能夠獲得與先進技術相關的專業知識和生產方法，¹然而較少採取政治制度與歷史因素進行分析。1980年代，由於全球經濟的轉變，使得臺灣已不適合勞力密集產業的生存，同時臺商也面臨東亞新興國家發展加工出口型產業的競爭。因此，臺灣政府發動一連串鼓勵對外投資政策，促使臺灣資本向外出走。²這些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改變，為1990年代臺商對外投資提供有利的條件，在東亞經濟發展過程中成為雁行模式梯隊的一員。

在東南亞國家中，越南當前的經濟發展成就，相信有目共睹。然而在1986年底國家決議採行革新開放政策，此時距離1975年越戰結束之際，不過才10年時間。即便越南在1987年頒布（隔年實施）新的《外人投資法》（*The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當時世界各國仍多抱持觀望態度，反觀臺灣商人卻積極前往越南考察投資，而且在開放後的近20年間（1988-2006），來自臺灣的累計投資額竟位居第一，其背後的歷史過程與制度因素是什麼？這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進而言之，本文的研究觀點並非是以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來解釋臺商資本的跨國移動，而是試圖藉由路徑依存（*path dependence*）的經濟社會學觀點，討論臺灣跨國資本是如何受到過去冷戰歷史的政經結構和臺越兩地的制度因素所影響。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採取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文獻資料除了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之外，還包含臺灣與越南兩地出版的越南華人資料、國史館館藏檔案、中央通訊社與聯合報資料庫。訪談資料則是

1. Axèle Girou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Rise of 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in Nick J. Freeman & Frank L. Bartels, eds., *The Futur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p. 106-107.

2. 龔宜君，《出路：台商在東南亞的社會形構》（臺北：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5年），頁17。

2001 年執行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³ 計畫團隊移地研究的訪談成果，以及 2020-2021 年在臺灣訪談越南臺商與外貿協會駐外人員，共計 11 家在越南投資的臺資企業和 16 位受訪者。1950-1970 年代，我國與越南共和國政府（南越）友好，⁴ 雙方合作交流頻繁並互設有大使館，當時我國官方的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和海外華人組織相繼投入越南華人的時勢分析研究，留下許多具有價值的越南華人研究資料。特別是國史館館藏的外交部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檔案，為本文提供 1960-1970 年代臺灣與南越雙邊經濟合作的研究史料與證據，進而說明今日臺商在越南的投資成就，乃是與冷戰歷史、制度因素的路徑依存有關。

貳、越南的革新政策與臺灣的南向政策

一、越南的革新政策

越南在 1975 年統一後至 1980 年代初期，苦於國際經濟的封鎖和鉅額國防負擔，當時對外依賴與蘇聯和東歐共產集團國家的經濟合作，對內則是透過經濟體制的管理改革，企圖解決生產效率低落的問題。然而擴大再生產所需的國內供給嚴重不足，僅依靠其他共產集團國家的消費財進口支撐，並不能刺激勞動意願與生產財的供給，⁵ 也就

3. 本文訪談資料出自陳東升、周素卿、曾嫵芬、龔宜君，《地域網絡與族群關係：東南亞台商的研究（計畫編號：90-2420-H-002-011-SC）》（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2001 年）之部分訪談內容。

4. 自 1954 年《日內瓦協定》簽訂後，隔年吳廷琰 (Ngô Đình Diệm) 主政的越南共和國 (Việt Nam Cộng hòa) 正式成立，以北緯 17 度為界與北方胡志明 (Hồ Chí Minh) 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Việt Nam Dân chủ Cộng hòa) 形成南北分治。下文所稱「南越」，即指越南共和國；「北越」，即指越南民主共和國。

5. Đặng Thị Loan, Lê Du Phong, & Hoàng Văn Hoa, *Việt Nam's Economy After 20 Years of Renewal (1986-2006):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Hà

是國內物資的匱乏是導致經濟發展停滯的主因。爲此，越南於 1986 年底所召開的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決議實行一系列政治經濟體制轉型的革新 (Đổi Mới) 政策，確立國家從中央計畫經濟朝向商品和市場經濟修正的開放立場。⁶

革新政策明確指出國家三大領域的經濟發展計畫核心：「糧食—食品」、「消費品」和「出口貨物」；揭示 1986-1990 年的經濟任務旨在確保民生所需用品，並累積發展工業的基礎。越南政府的具體做法是落實輕工業以及小型工業、手工業能夠滿足人民對一般消費商品的需求。⁷強調並鼓勵外人投資的多種形式，尤其是頒布相關法規提供外國人和國外越僑便利條件，以進行合作經營（革新初期以合資爲限）的各種政策和措施。⁸國家企圖藉由引進外資建立起輕工業基礎，刺激國內糧食與消費品的生產，進一步累積生產加工技術發展出口工業。因此，可以說在越南革新開放初期，外資對於解決過去經濟結構的失衡扮演著極爲重要的角色。

根據 1988-2006 年間的統計，以外資投入項目的案件數量來看，來自亞洲國家的投資占 60.8%、歐洲占 23%、美洲占 7%；亞洲國家地區主要爲臺灣 (13.41%)、新加坡 (13.35%)、南韓 (12.9%)、日本 (10.79%) 和香港 (8.73%)，這些國家地區投入約四千多個項目，總金額約 350 億美金，占所有外資註冊資本額的 45%。投入的項目和金額分配最多的省市均爲胡志明市，若再加上如同奈、平陽、巴地—

Nội: Gioi Pub, 2010), p. 178.

6. Vu Quoc Tuan & Nguyen Dinh Cung, "Development Various Types of Enterprises," in Dinh Van An, ed.,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oriented Market Economy in Vietnam* (Hà Nội: The Statistical Publisher, 2003), pp. 8-54.

7. Đặng Thị Loan, Lê Du Phong, & Hoàng Văn Hoa, *Việt Nam's Economy After 20 Years of Renewal (1986-2006):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p. 178.

8. 梅李廣編，吳彩瓊譯，《越南全景》(*Việt Nam toàn cảnh*) (河內：世界出版社，2004年)，頁 168。

頭頓、隆安等周邊省份，合計投入件數比例為 64.13%，金額比例為 59.62%，顯見胡志明市及其周邊地區為吸引外資最多的區域。⁹

二、臺灣的南向政策

由於 1980 年代全球以及臺灣經濟結構的改變，促使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商資本開始西進中國和南向東南亞。當時政府和國民黨黨營事業為了分散投資過度集中於中國的經貿風險，曾考慮過到前蘇聯、東歐、中東、南非、印度、緬甸、越南等地投資，後來決定選擇越南，多少也是配合當時的南向政策。¹⁰而前往越南的臺商依照時間先後也有著不太一樣的形象，像是 1988-1990 年多半是跑路過去的，1991-1993 年則是標會籌措資金過去的，1993-1995 年是在臺灣經營不下去又有點積蓄的人過去的，1995 年後才是大企業過去。¹¹「一只皮箱走天下」形容的是臺商拼搏外向的商業經略性格，實際上多數中小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評估時，除了運用人際網絡資源外，也會尋求商業組織的協助。受訪臺商說：「1988 年我跟外貿協會一起去越南考察，外貿協會好像是 89 年設立據點（正確時間為 1991 年），是比政府的代表處還要早成立。」¹²

早於 1988 年 6 月，臺灣外貿協會即組團前往胡志明市進行投資考察。¹³1991 年，越南政府核准臺灣外貿協會在河內和胡志明市設立

9. Bùi Huy Nhưỡng, *FDI Disbursement in Việt Nam* (Hà Nội: Gioi Pub, 2010), pp. 12-15.

10. 王宏仁，《全球生產壓力鏈：越南台商、工人與國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年），頁 43-44。

11. 王宏仁，〈性別化的草根跨國社區：以台越關係為例〉，王宏仁、郭佩宜編，《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臺北：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9 年），頁 170。

12. 作者，當面訪談，VNTS012020，臺北市臺商公司，2020 年 11 月 12 日。

13. 僑務委員會，《華僑經濟年鑑(1989)》（臺北：僑務委員會，1989 年），頁 352。

辦事處，隔年我國獲准設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對越投資遂大幅增加。我國經濟部於1993年12月提出〈經濟部南進政策說帖〉，以具體做法協助勞力密集產業移向東南亞。次年行政院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1994-1996年為第一期），正式推動南向政策，加強開拓與東協國家經貿關係及因應東南亞經濟整合之趨勢，南向政策遂正式展開。¹⁴自1994年起，越南被臺灣列為南向政策的重點國家之後，臺商已將越南預設為前往東南亞投資的首選。¹⁵2010年之前，臺灣在越南外人直接投資的累計項目案件與金額長年居於第一位，如果加上未報准或透過第三國如維京群島、開曼群島或香港、新加坡等地註冊後轉投資，¹⁶或有使用人頭投資的情況，¹⁷其實際金額規模應該更大。

東亞雁行模式指出，1980年代臺灣的對外直接投資，是新國際勞動分工的一種典型，廉價的勞動力被視為跨國資本流動的主要動力，它雖然跨越國家疆界自由流動，但依然受到制度和文化邊界的影響。跨國資本並非如無國界的世界 (borderless world) 所描述那般恣意蔓延，它會受限於投資國本身地方脈絡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多樣性，全球化不僅受到地方表述的調節，也與之互動。¹⁸ 以下將以「路徑依

14. 黃奎博、周容卉，〈我國「南向政策」之回顧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12卷第8期，2014年8月，頁61-69。

15. 顧長永，《台商在東南亞：台灣移民海外的第三波》（高雄：麗文文化公司，2001年），頁12。

16. 許文堂，〈台灣與越南雙邊關係的回顧與分析〉，施正鋒主編，《崛起中的越南》（臺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2013年），頁10。

17. 龔宜君，〈「佔名」關係：台商與越南女性的親密關係形構〉，《臺灣社會學刊》，第45期，2010年12月，頁213-247。

18. Y. Hsing, "Blood, Thicker than Wa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Southern China," in Trevor J. Barnes, Jamie Peck, Eric Sheppard, & Adam Tickell, eds., *Reading Economic Geography*

存」的經濟社會學觀點，討論臺商跨國資本是如何受到過去冷戰歷史的政經結構和臺越兩地的制度因素所影響。

參、跨國資本的路徑依存

一、路徑依存觀點

格蘭諾維特 (Mark Granovetter) 批評所謂的理性經濟人觀點，其對行動者的理性假定是一種原子化的個人實現決策和行動，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都假設理性的、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幾乎不受社會關係所影響，是一種近乎理想的狀態。¹⁹ 因此，他提出鑲嵌性 (embeddedness) 觀點作為反駁，認為人們行為與制度總是受到社會關係的限制。經濟行動是鑲嵌在具體的、持續的社會關係之中，而且是在路徑依存中持續建構的。

諾斯 (Douglass C. North) 則認為關於政治經濟體系變遷過程的真實面貌 (reality) 儘管不為人知，但人們確實建構了這個真實本質的詳盡信念 (beliefs)，此種信念既是政治經濟體系運作方式的明確模式，也是它應該如何運作的規範模式。當企業家為了提升自己的經濟或政治地位而尋求創新或修改制度時，所形成的制度體系對他們的選項就產生了嚴格的約束，由此導致的路徑依存通常使得變遷是漸進發生的。信念體系和制度架構有著密切的關係，信念體系是內在表現，而制度是這種內在表現的外在顯示；這種關係經常以非正式制度形式出現，也就是行為規範、習俗和自願遵守的行為準則。除了面對政治經濟變遷的歷史特徵之外，全面理解路徑依存的重要步驟是認識到累積生成的制度所產生的某些組織，它們能否存續下去取決於那些制度的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4), p. 363.

¹⁹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November 1985, pp. 481-510.

支持，因此這些組織會動用資源來維繫生存。路徑依存與其說是一種慣性 (inertia)，其意涵更接近於過去的歷史經驗所施加給現在的選擇集合的約束，因此理解路徑依存的本質，用意在確定各種環境中路徑依存對變遷所施加限制的性質。²⁰

從微觀層次來看，作為企業家的臺商在思考跨國投資的決策過程中，經由日常演化所形成的慣例就會引導行動者簡化決策任務，其目的在縮短尋找事實、處理訊息和實際行動的過程。尤其是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和決策，對於個體在外在環境中尋找機會似乎存在著偏見，使得個人選擇被局限於特定範圍內的潛在選項中。²¹ 受訪臺商說：「我本身接觸越南業務，是因為我老婆姐姐的前夫本身是越南華僑，他當時就在牽這條線。」²² 也就是說，臺商在進行跨國投資評估時，會透過現存的慣例在現有的解決方案中尋找答案，而人際關係經常會是優先考慮的資源網絡。

廣義上，「路徑依存」是指在時間順序中事件發生的原因與前一階段的事件相關；也就是前一階段時間裡發生的事情，將影響後一階段出現的一系列事件的可能結果。此觀點強調的是「歷史至關重要」(history matters)，如果不清楚事件發生所依循的路徑 (how it got there)，那麼我們將無法理解特定社會變項的重要性。²³ 在諾斯的制度

20. Douglass C. North,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8, 48-64, 71-78.

21. Anders Malmberg & Peter Maskell,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Localized Learning and Spatial Clustering," in Ron Boschma & Ron Martin, eds.,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10), p. 393.

22. 作者，當面訪談，VNTS012020，臺北市臺商公司，2020年11月12日。

23. William H. Sewell,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errance J.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262-263; Paul Pierson,

演化分析裡，路徑依存是指制度架構決定了路徑選擇的方向，在經濟地理學領域中，經濟地理學家很早就認識到經濟地域的「路徑依存性」，其顯著特徵就是「地方依存」。路徑依存的基本機制，如各種形式的收益遞增和外部性、網絡效益等，在其形式和運作上都具有強烈的地方依存現象。²⁴

基於路徑依存觀點，臺商在進行跨國投資決定時，除了會受到自身人際網絡資源所影響外，投資國的地方依存也是另一個討論重點。從地理分布來說，越南革新後臺商前往越南進行考察投資的首選之地，為什麼會集中於南部的胡志明市及其周邊省份地區呢？

二、南越的地方脈絡

關於外人直接投資的研究分析並沒有明確指出何謂華人公司 (ethnic Chinese companies)，但是卻時常將臺灣、香港、新加坡視為華人血統國家 (Chinese-descent countries)，並作為一分析單元。²⁵ 在 1994 年底美國對越南解除經濟制裁，歐美日韓等國家大舉投資越南之前，越南前三大投資國家與地區分別是：臺灣（19 億美元）、香港（15 億美元）、新加坡（10 億美元），約占所有外人投資總額 60%，可以說越南革新開放初期的經濟發展很大部分是由國外的華人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e 2000, pp. 251-267.

24. Ron Martin & Peter Sunley,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6, No. 4, August 2006, pp. 395-437.

25. Kit G. Machado, “Japanese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East Asia: Linkag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Jomo K. S. & Brian C. Folk, eds., *Ethnic Business: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216-217.

資本所支撐起的。這是因為投資企業的主體是華人資本，因此多選擇在胡志明市周邊的華人企業作為接觸與投資的對象；另一可能原因則是南部過去由資本主義政權統治，其歷史觀和價值觀比較接近外國資本家。²⁶

西貢堤岸地區歷史上即為華人聚居區，1975 年以前南越華人的資本、企業和熟練的勞動力，在國內市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²⁷ 在 1975 年國家統一後，越南政府隨即實施國家經濟計畫，1978 年特別針對南越地區實施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加強對所有生產方式和消費物資的統一管理，停止所有資本主義商人的活動，這一連串措施對仍留在南越的華人資本家造成很大打擊。另外，南部的農業集體化也遭遇困難，擁有巨大生產潛力的湄公河三角洲卻因社會主義改造而停滯；由於南部對私營工商業採取嚴格管制，造成大量以華人為主的海上難民。²⁸ 計畫經濟下所產生的集體生產小組和合作社相繼倒閉，證明集體形式的家庭小經濟是沒有效益的，自 1980 年代起經濟領域的寬鬆政策，使華人的傳統家庭小經濟又迅速地發展起來。²⁹

1986 年底所召開的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另一大特徵是，越南共產黨最高領導層的新舊交接，取而代之的是以黨書記阮文靈 (Nguyễn Văn Linh) 為首，范雄 (Phạm Hùng)、武文傑 (Võ Văn Kiệt)、武志功 (Võ Chí Công) 等支持領導革新政策的新任幹部，這些

26. 窪田光純著，林雅倩譯，《躍動的國家：越南》（躍動する国ベトナム）（臺北：大展出版社，1997 年），頁 148-153。

27. Tran Khanh, *The Ethnic Chine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p. 1.

28. 白石昌也著，吳瑞雲、田川雅子譯，《越南：革命與建設之間》（東アジアの国家と社会：ベトナム）（臺北：月旦，1994 年），頁 138-147。

29. 莫唐，〈胡志明市華人經濟的發展〉，《八桂僑刊》（南寧），1996 年第 1 期（總第 29 期），1996 年 1 月，頁 59-63。

人多是出身南部或是戰爭期間／戰後在南部擔任重要職務工作者。這些過去在南部推動社會主義工作的共產黨幹部，已然察覺到過去北越採行的集體統制經濟體制，內含各種問題與矛盾。所以在革新政策後，積極推動改革指導立場的領導人，以體驗過南部社會的人居多，便是這個原因。此外，越南南部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就有異於北部和中部的元素，即是緊鄰東南亞海洋商業圈並以廣大肥沃土地為基礎的湄公河穀倉地帶而發展起來，經濟型態是以米業輸出為主與外界接觸，農業與商業緊密結合的傳統原本就很強大；加上當時掌握米的收購與輸出業務的人，便是具有經濟勢力的各幫華僑。特別是胡志明市，已是南部農產物的集散地與國外市場的連結埠，或是海外資本進出之合資企業的首選地。南部社會的對外開放性，內藏著迴避北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河內）或中部（阮朝時代的皇都順化）的國家中央權力，而是有著直接與外部世界連結的傾向。除了胡志明市所吸引的外資金額大幅領先其他地區之外，居住海外約 200 萬的越僑也多數為南越出身，其中約有 35%-40% 有華人血統。海外生活的情況或資本主義世界的情報，透過回國省親的越僑也帶入了南越。而且南部曾是法國和美國統治的進出據點，實際體驗過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管理和生活方式；以及華僑／華人資本大量投入經濟建設，這些無形和有形遺產無論好壞都被遺留下來，可以說南部社會是具有開放性的世界主義性格。³⁰

越南政府自 1986 年底決議採行革新開放以來，國家的經濟表現可以說是一種爆炸性成長，弗里曼 (Donald B. Freeman) 特別指出，很多研究認為這是因為中央政府積極的商業擴張與市場開放所致，但

³⁰白石昌也，《越南：革命與建設之間》，頁 182-183、209-210；Tran Khanh, "Ethnic Chinese in Vietnam and their Identity,"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284。

實際上政府對於各地的經濟開發和投資審查抱持著謹慎嚴審的態度。從資料上解讀，此戲劇性的經濟成長是繞過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河內及其周邊地區，反而聚集在胡志明市及其周邊地區，特別是此地區的非正式部門經濟呈現空前的繁榮：小企業／小店家林立，非正式的金融業務和非常規的貿易活動頻繁，這些都為胡志明市的發展奠定基礎。³¹ 革新後，華人對國內市場的開發與小工業發展的資本積累再次發揮積極的作用。³² 由於越南華人的商業網絡及經商技術都還在，因此革新後可以很快重新建立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根據 1994 年的官方統計，胡志明市的私有企業約有 4,900 家，其中有 40% 由華人經營；1990 年代末，該市華人企業家占有所有企業家總數的三分之二。³³

肆、冷戰美援架構與華人制度因素

一、冷戰體制下的美援架構與臺越交往

二次大戰結束後，許多新國家陸續成立並向國際社會要求援助，以滿足它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美國決策當局憂心這些剛成立的國家政權因為貧困而倒向蘇聯共產集團，在此脈絡下形成一種以美蘇為首的冷戰局勢。1950-1960 年代，美國學界興起各種「現代化」發展理論的分析研究，對遏止共產主義擴張的政策制定者產生了特別的吸引力。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套經驗性的發展模式，特別是將西方的、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作為模型，一體適用到這些剛

31. Donald B. Freeman, "Doi Moi Policy and the Small-enterprise Boom in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86, No. 2, April 1996, pp. 178-197.

32. Tran Khanh, *The Ethnic Chine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p. 1.

33. 許文堂，〈越南華人公民地位的變遷〉，陳鴻瑜主編，《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臺北：華僑協會總會，2014年），頁 165-167。

成立的第三世界國家。³⁴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為東亞區域安全考量，次年美國國會通過《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開始對臺灣提供各種經濟援助，此後經援臺灣成為有計畫的援助行動，不管是經費規模或技術支援，均以協助臺灣工業達到自給自足為目的，提升臺灣工業發展能力為工業化與現代化奠定基礎。美國從1951年到1965年6月終止對臺援助為止，總共提供臺灣將近15億美元的援助。美援金額約占1951年到1960年臺灣進口金額的40%，占同一期間臺灣投資毛額的38%，也占當時臺灣國民生產毛額的6%；³⁵1950-1960年代期間，美援確實對臺灣的經濟民生帶來重要影響。

與此同時，戰後美國也以軍事經濟援助協助法國對越共作戰，韓戰爆發後甚至派遣軍事顧問進駐越南。當時美國深信共產黨在東南亞可能造成骨牌效應，除了透過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提供南越軍事保護與支援之外，³⁶也透過各種國際社會合作與組織參與形式援助南越政權，據估計，南越為1950-1960年代接受美援次多的國家（僅次於南韓）。例如1947年，依據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在中國上海成立的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Far East*)，其目的即在促進戰後亞洲經濟的重建與發展，是亞太地區最早建立的政府間多邊經濟社

³⁴Michael E. Latham 著，牛可譯，《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頁3-7。

³⁵中央通訊社，〈台美合作回憶美援物資抵台〉，2022年2月17日（檢索），《中央通訊社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https://cnaphoto.culture.tw/home/zh-tw/EventStory_01>。

³⁶唐向宇，《南越第一共和國興亡史：越南戰爭序曲》（臺北：獨立作家，2014年），頁173。

會發展組織，³⁷ 臺灣與越南均為該組織成員，雙方即在組織運作下加強彼此貿易和技術各方面的合作。

1950年代越南的對外貿易呈現大量入超，端賴美援支持；據《紐約時報》報導，1957年越南所獲美國援助，計為2.5億美元，折合越幣約88億3,750萬。³⁸ 此2.5億實為美國支持南越吳廷琰上臺後所實施的第一期五年新經濟計畫(1956-1961)，包含全部軍事經費和80%的政府開支，並解決每年1.7億美元的貿易赤字問題，³⁹ 美援對於南越經濟之重要性可見一斑。1959-1961年，美援金額從1.92億美元逐年減少為1.79億、1.42億，但仍占國家輸入外匯比例高達85.7%、74.3%、55.5%，⁴⁰ 遞減原因可能是因為前年基期高以及第一期五年新經濟計畫略收成效之故。南越政府為振興經濟活絡社會，大力推行第一期五年新經濟計畫，在以美援為架構的國際政治經濟交往下，越南與臺灣展開雙邊緊密的經濟與社會合作。⁴¹ 南越政府對友邦更是給予特別優惠，特別是美國與臺灣。若前往南越投資工業生產可以低價購買國有地，甚至可以請求政府撥給土地設立工廠，並給予免稅5年。1958年後，臺灣、香港和美國商人相繼赴越進行投資，例如水泥廠、棉紗廠、紡織廠、塑膠廠；1961年後，有更多的紡織廠、木材／三夾板廠、玻璃廠、紙廠、印刷廠、漁業公司等。並積極建設電

37. 郭壽華編，《越、寮、柬三國通鑑》（臺北：自行出版，1966年），頁115、126。

38. 郭壽華編，《越南通鑑》（臺北：幼獅書店，1970年），頁103。

39. 阮高祺著，陸宗璇譯，《二十年零二十天：空軍元帥阮高祺回憶錄》（*Twenty Year and Twenty Days: Nguyen Cao Ky*）（臺北：開源出版事業，1977年），頁117。

40. 國史館藏，〈中越經濟合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數位典藏號040-010600-0049。

41. 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館經濟參事處，《越南投資參考資料》（西貢：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館，1962年）。

力和自來水等基礎設施，後來的糖廠、冰淇淋和牛奶公司，也都是由臺、越、美籍人士所建立的。⁴²

當時的臺越合作幾乎都是由雙邊政府進行主導，並讓海外華商與臺商出資參與。這些經濟建設發展計畫，主要集中在幾個特定領域：如農業、紡織、貿易、水泥、交通、糖業、電力、漁業等，以下將以農業（糖業）、紡織和貿易方面作為說明。1958年7月，臺灣政府應南越政府邀請，由經濟部長楊繼曾委派時任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兼經濟部工礦計畫聯繫組召集人李國鼎率團訪問，此訪問團主要任務為考察越南經濟。行程結束後，遂將結果做成改善越南農工及礦業報告書一冊提供南越政府參考，此舉深獲南越當局重視，遂開啓日後兩國全面經濟合作之始。⁴³此行亦數度拜訪當地僑領陳敦陞、馬國宣、翁典南、陳立矩等人，說明因應國家經濟發展需求，由商業轉向農工礦生產事業之趨勢，建議華商僑領配合南越政府之需要辦理各項工業投資。⁴⁴

為落實兩國合作計畫，1959年1月在我國駐越大使館下設立經濟參事處，負責推動雙邊貿易與技術合作。兩國同意每年召開一次「中越經濟合作會議」，會議地點輪流在西貢和臺北兩地舉行。⁴⁵1959年3月，臺、越、美三方在臺北簽訂了一項合作計畫，係由台糖公司派遣技術團赴越，協助越南建立三座糖廠。當時南越政府雖訂有鼓勵外人投資辦法，但所有申請案件均需經過美援署審核並報華府公

42. 潘朝英、賴丹尼，《越南危機》（臺北：徵信新聞報，1966年），頁115。

43. 國史館藏，〈中越合作會議（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數位典藏號 040-010500-0108。

44. 國史館藏，〈中華民國赴越南經濟訪問團訪問經過報告書〉，《陳誠副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 008-010601-00014-001。

45. 郭壽華編，《越、寮、柬三國通鑑》，頁178。

布；⁴⁶ 區區一件糖廠合作案卻出動三國高層官員，參與簽約者有越南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黎玉瑚、台糖公司總經理雷寶華、美國共同安全分署經濟政策組長華倫、台糖公司協理兼越南糖業技術服務團團長於升峰、美國共同安全分署法律顧問史考特、我國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李國鼎、經濟部長楊繼曾，⁴⁷ 由此可見當時的冷戰氛圍以及美援對臺越兩國的影響甚鉅。

1960年10月，南越政府外援運用局長武文泰先行抵臺籌備並磋商「中越經濟合作會議」討論事項；12月，臺越雙方正式於西貢召開第一次合作會議；1962年，在臺北舉行第二次經濟合作會議，雙方至1974年為止總共舉行九次經濟合作會議。⁴⁸ 臺越雙方技術合作進展迅速，臺灣進駐南越政府機構服務者包括有農業技術團和電力技術團，前者團員80人，後者8人。在民間機構與企業公司服務的多

46. 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館經濟參事處，《越南投資參考資料》。

47. 蔡育文，〈台糖公司砂糖產業南向軌跡（上）〉，《台糖通訊》，第2072號第142卷第2期，2018年3月，頁32。

48. 中央通訊社，〈出席中越經濟合作會議代表李國鼎（左）和長蔣彥士（右）啓程〉，1960年12月12日，《中央通訊社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https://cnaphoto.culture.tw/home/zh-tw/CulturePic_50/316109〉；中央通訊社，〈越南政府外援運用局長武文泰來台〉，1960年9月20日，《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600920005800&IMG_SUB_ID=19600920005800001&page=1〉；中央通訊社，〈第七屆中越經濟合作會議閉幕並簽署聯合公報〉，1971年9月15日，《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710915009400&IMG_SUB_ID=19710915009400001&page=1〉；中央通訊社，〈第九屆中、越經濟合作職官級會議在經濟部舉行〉，1974年11月26日，《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741126014002&IMG_SUB_ID=197411260140020001&page=1〉。

達 25 個單位，技術人員為 140 人；在公私合營機構及企業單位服務的技術人員，總人數 220 人。雙方農業技術合作始於 1959 年 3 月，亦即上述提及由台糖公司組成的 10 人糖業技術團赴越考察 4 個月，為南越政府擬定在平陽、廣義和綏和等地設立三座糖廠的計畫。另一個農業技術合作項目是南越政府透過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聘請臺灣農會及漁業合作社專家，組織一個 11 人農會技術團赴越，協助南越改進各級農會和漁會組織，以及訓練農漁會幹部推行農村養豬計畫；緊接著是農作物改良團、農田水利團等技術人員陸續赴越工作。除了農業技術合作之外，其次較大的合作項目為紡織工業，1958 年，我國兩位紡織工業專家蔡元和趙耀東應越南企業邀請前往規劃廠房，隔年率領 38 位技術人員赴越建廠與安裝生產機器，1960 年越南紡織廠正式投產。有了越南紡織廠的成功經驗，其後陸續有越美紡織廠、東南亞紡織公司、越南合作纖維公司、國際紡織廠、越南印染公司等，均聘請我國紡織技術人員赴越建廠並主持開工生產。1961 年，國營越南棉紗工業公司復聘請趙耀東等 25 人代為籌建峴港棉紗廠，1963 年 7 月完工並由我方技術人員安裝機器及開工生產。截至 1966 年 11 月，我援越技術人員共 493 人。⁴⁹

在越南貿易輸入方面，當時一切的進口活動均須由政府發給進口許可證才可從事相關貿易。1950 年代，越南對外貿易進口因法國殖民關係，一向以法國為最大宗。1955 年（《日內瓦協定》生效）之後，法國進口比例逐年下降，而美國與日本則因美援採購進口快速成長。美援進口產品除共產國家外多可輸入，但自 1962 年起排除英、法、日等 19 個經濟發達國家，實施採購地區限制辦法，其用意無非是增加美國輸出並限制發達國家的輸出貿易，以符合美援用來援助未充分開發國家的立意。根據統計，南越自 1955-1962 年，總共接受美

49 郭壽華編，《越、寮、柬三國通鑑》，頁 178-179。

國經濟援助約 17 億美金，其中 16 億為贈與，其餘為貸款。⁵⁰1962 年起，因為美援限制採購地區辦法生效以來，臺灣輸出南越貨物快速成長，據 1964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該年南越自臺灣進口金額僅次於美國（請見表 1），⁵¹足見 1960 年代兩國貿易投資往來密切與美援架構的經濟形塑息息相關。1950 年代中期至 1975 年南北越統一前，臺灣對南越貿易均呈現出超，南越可以說是當時臺灣最大的貿易夥伴。⁵²

表 1 南越進口國家及金額 (1962-1964)

	國家 / 地區	1962 年	1963 年	1964 年
1	美國	97.2	107	126.3
2	臺灣	25	37.5	38.3
3	日本	44.6	31.4	18.2
4	法國	35	31.4	18.2
5	印尼	14.2	18.9	13.2
6	義大利	4.9	6.4	8.5
7	德國	10.3	7.1	8.4
8	南韓	0.7	13.5	7
9	印度	1.5	6.7	6.4
10	葡萄牙	1.7	2.5	4.9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任行政院長時：越南中央行政委員會主席阮高奇訪華〉，《嚴家淦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 006-010604-00002-014。

說明：金額單位為百萬美元，前十位排序以 1964 年進口金額為依據。

50. 郭壽華編，《越、寮、柬三國通鑑》，頁 126-127；郭壽華編，《越南通鑑》，頁 103。

51. 國史館藏，〈任行政院長時：越南中央行政委員會主席阮高奇訪華〉，數位典藏號 006-010604-00002-014。

52. 梁錦文，〈1990 年代越南與我國關係之分析〉，許文堂主編，《越南、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轉變》（臺北：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1 年），頁 190。

二、臺越經貿交往中的華人制度因素

(一) 臺灣的僑務政策

我國政府僑務工作由來已久，早於 1924 年在廣州成立「僑務委員會」，1931 年制定《僑務委員會組織法》，隸屬行政院會內分設秘書、僑民管理、僑民教育等三處。國民政府來臺後，1952 年在臺北舉行首次「全球僑務會議」，其後政府透過華僑歸國投資方案及獎勵辦法之擬定，結合海外華僑的財力人力為臺灣經濟奠定基礎。同時，僑委會也積極推動海外華商與國內廠商合作開發資源，工商業對外投資多與海外華商採取合作方式。⁵³ 華僑在海外以從事經濟事業為多，華僑經濟的輔導遂為僑務的重點工作之一。1956 年 10 月舉行的「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即由僑委會、經濟部與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聯合舉辦，會議旨在針對當時華僑的處境釐訂相關的政策，而主管華僑經濟輔導工作即為僑委會第三處。⁵⁴

1955 年 12 月，越南共和國頒布《國籍法》對本地華人採取強制入籍政策，隔年 8 月將原法第 16 條修正頒布〈第 48 號諭令〉：規定舉凡華人所生越南出生子女，一律為越南人。9 月再頒布〈第 53 號諭令〉：規定十一種職業，禁止外僑、華僑、外國商業會社暨外國公司經營；對於限制之職業則必須在 6-12 個月內清理結束相關業務，而入籍越南者自然不受限制。⁵⁵ 此舉引起我國政府至為關切，遂由外交部次長胡慶育率領有關機關主管長官組團前往疏解，首要成員即為負責掌管華僑經濟輔導事務的僑委會第三處（經濟處）處長何宜武。何氏身為事業目的主管機關長官，出發前夕急電越南通訊員蒐集資

53. 僑務委員會，《光輝的軌跡：僑務委員會六十週年會慶實錄》（臺北：僑務委員會，1992 年）。

54. 何邦立，〈何宜武華僑經濟五十年〉，何邦立、汪忠甲編，《何宜武與華僑經濟》（臺北：華僑協會總會，2015 年），頁 127。

55. 郭壽華編，《越南通鑑》，頁 144、174-175。

料，漏夜編印「華僑經濟參考資料」於飛機上分贈全體團員參閱，亦為在越期間處理團務之參考。該資料詳盡分析南越政府的決策原因和華僑所可能承受的衝擊，並擬議勸導僑胞入籍或改由具越籍子女登記營運。⁵⁶ 依據 1968 年 7 月南越外僑局公布統計資料，旅居之我國僑民僅餘 4,800 人，除選擇志願來臺者外，可見多數華僑均已轉入越籍。在華僑入籍案塵埃落定後，華人與越人經濟權利不再差別待遇，由於當時南越政府獎勵發展工業建設，當地華人經濟出現從商業資本移向工業投資的情況。⁵⁷

1960 年代，南越經濟開始受到國際貿易和美援的刺激，1965-1975 年間堤岸華人經濟蓬勃發展，當時華人參與的外資大企業有越南紡織廠、越美紡織廠；中小企業有東亞、聯芳、成功等紡織廠和振亞、合成針織廠。化學原料廠有同奈的鹹氨公司、大同公司；調味食品業有天香和味豐食品公司，這些公司產品不僅供應中 / 南部各省需求外，也外銷到東南亞鄰近國家；這些工廠的主要機械設備都進口自日本、德國、英國、臺灣等國。⁵⁸ 當時號稱東南亞最大織造廠的越南紡織廠，即為南越政府第一期五年新經濟計畫的重要施政，其中倡議最力者為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陳敦陞，他也是該廠副董事長，董事長張維岳以及另一位副董事長李良臣皆為華人。⁵⁹ 1974 年，我國世華銀行經籌備多年後正式成立，由國外華僑出資 50%，本國 17 家銀行出資

56. 何邦立，〈何宜武華僑經濟五十年〉，頁 113、130。

57. 海外出版社編，《越南華僑與華裔》（臺北：海外出版社，1970 年），頁 10。

58. 劉為安，《堤岸今昔》（胡志明市：市文化文藝出版社，2016 年），頁 129-131。

59. 作者不詳，〈越南工業的今昔：越南紡織廠簡介〉，施達志編，《華裔在越南》（堤岸：統一書局，1963 年），頁 6-7；張文和，《越南華僑史話》（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5 年），頁 89-90。

50%；南越僑領陳敦陞亦為首屆常務理事之一。⁶⁰1950-1970年代，臺灣與南越很多合作案是以越南華人（商）作為中介，原因除了華人掌握當地經濟事業之外，其實也與中華民國政府長期的僑務政策制度因素有關。

(二) 越南的華人工作處

1975年南北越統一，南越臨時革命政府立即接收越南共和國的資產和外資企業，同時禁止私營對外貿易和銀行金融業務，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75年9月，南越臨時革命政府以排除獨占買辦資本家為由，治安當局大舉檢查以堤岸為中心的華人資產家的家產和倉庫，扣押其資產並逮捕數百名商人。⁶¹加上1977-1979年間，越南與中國因共產集團內部矛盾與邊界問題彼此關係緊張，華人處境就更加艱困。1983年，越南共產黨政治局通過的第14號法案表明：「禁止華人參與商業、交通、出版、文化事業、資訊和學校經營」，該法案明顯地妨礙與限制了越南華人的經濟社會活動，也對華人融入越南社會造成影響。⁶²

不過有一群華人共產黨員，在國家統一後因為政治任務有功而獲得表揚，即在越南共和國時期於南部從事協助北越工作的「華運」組織成員。⁶³1959年底，南部共產黨人為落實第三屆黨中央委員會第15號決議（南方同胞反美吳鬥爭運動），西貢—堤岸—嘉定特區委決定

⁶⁰何宜武，〈奉命籌辦世華聯合商業銀行〉，何邦立、汪忠甲編，《何宜武與華僑經濟》（臺北：華僑協會總會，2015年），頁75。

⁶¹白石昌也，《越南：革命與建設之間》，頁138。

⁶²Tran Khanh, *The Ethnic Chine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p. 277.

⁶³梁鴻德，〈華運力量戊申春季總進攻與起義及建設與捍衛祖國的貢獻〉，《西貢解放日報》，2018年2月10日，版2；〈華運武裝力量聯絡組聚會〉，《西貢解放日報》，2019年4月21日，版2；〈華運在抗美救國事業中貢獻良多〉，《西貢解放日報》，2020年12月9日，版1。

成立直屬特區委工運處的「華人工運幹事處」。1967 年，特區黨委兼華運處成立，延續前華人工運幹事處的活動，其組織任務是動員西貢的華人工人階層、勞動者反對美國勢力和南越政權。黨委兼華運處下轄五個幹事處，分別是：工運、勞動區、軍事、財經、學運，⁶⁴ 從華運處的組織組成中專門設立「財經」一組，可以看出南越華人的經濟地位與影響，一直是南方共產黨人積極運動的目標。1986 年，隨著越南實施革新政策，政府對越南華人政策也有所調整，1987 年頒發第 256 號法令，旨在確認華人為越南公民與越南人擁有相同權利和義務。並從 1987 年始，為加強對華人工作，越共中央民運部設立了華人工作委員會，在省、市級設立華人工作處，專門負責組織和聯繫華人事務。⁶⁵

革新後，政府公布第 256 號法令並改組華運處成立華人工作處，亟欲修復與華人之間的關係，甚至是透過本地華人的力量對外進行招商。由於革新初期越南仍名列美國貿易禁運名單之中（1994 年解除），因此海外華人遂成為招商的首要對象，這項工作似乎以會說華語的華人共產黨員為最適合人選。受訪臺商說：「我當時跟外貿協會一起去越南，越南那邊接洽我們的是胡志明市第十一郡負責經貿的單位，接待我們的人是潘正養，他是越南華人，是南部人。他出身越共南解，當時沒有人知道！他是類似工商部的角色，很積極在做這一方面的外貿推廣。當時，我們跟外貿協會一行六人，透過他引薦去跟胡志明市黨書記見面……。」⁶⁶

潘正養曾擔任前總理武文傑的經濟顧問，被指派將胡志明市加工

64. 梁鴻德，〈華運力量戊申春季總進攻與起義及建設與捍衛祖國的貢獻〉，版 2。

65. 褚廷福，〈越南華人之公民地位(1986-2011)〉，陳鴻瑜主編，《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臺北：華僑協會總會，2014 年），頁 181-182。

66. 作者，當面訪談，VNTS012020，臺北市臺商公司，2020 年 11 月 12 日。

出口區發展成全越南經濟特區的試點與模範。1989年，他曾帶著發展計畫書到訪臺灣，與我國行政院經建會官員討論合作事宜，後來發展加工出口區的計畫得到國民黨黨營事業中央貿易開發公司的支持，與胡志明市政府合作發展開發「新順加工出口區」。⁶⁷當時越南第一個與外資（臺灣）合作開發的新順加工出口工業區的高層說：「越南中央就指定了胡志明市政府，市政府特別成立了新順工業發展公司專門跟我們合作。新順工業發展公司總經理兼聯營公司的副總，他是一個華僑，以前當過國營貿易公司的總經理，也是越南前總理武文傑的經濟顧問，後來他被指派工作因為他是華人吧，所以跟我們中央貿開作為聯繫窗口。」⁶⁸擔任此一居中協調重要任務工作者即為潘正養。根據潘正養自述，1990年初，他擔任胡志明市投資與進出口協會秘書時，曾於胡志明市第五郡堤岸進出口公司（CHOLIMEX）辦公室接待來自臺灣的商業拜訪團，而該團團長即為中央貿開董事長丁善理。⁶⁹

潘正養認為越南華人與世界各地華人有著廣泛聯繫，尤其是在臺灣、香港和東南亞各國的華人。這使得華人易於獲得較多有關經濟、商業、技術和市場等訊息，也因為講信用的商業傳統，亦能順利取得海外華人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對鼓勵國內外投資的政策及參加越南經濟建設有重大的貢獻。在投資越南的國家中，臺灣不單是投資金額大、行業多，而且還是最早投資越南的；同時也是一個有眾多廠商與

⁶⁷宋秉忠，〈貿易門戶敞開後，經濟力正崛起、消費力已抬頭越南機會財還剩多少？〉，《遠見》，第249期，2007年3月，《遠見》，<<https://www.gvm.com.tw/article/11588>>。

⁶⁸作者等，當面訪談，VHOTAT1，胡志明市第七郡新順工業區，2001年6月29日。

⁶⁹潘正養，〈播種者丁善理先生〉，嚴慧玲主編，《謹把這裡作故鄉：對故丁董事長善理先生的回憶》（臺北：中央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27。

越南華人有著緊密關係的地方。⁷⁰在革新初期，臺灣具有半官方色彩的外貿協會和許多臺商前往越南進行商務考察，確實如此。受訪的外貿協會人員與臺商說：「我們外貿協會第一次就組了一個五個人的調查訪問小組去越南，也是透過當地華僑。」⁷¹「我們集團在越南的代表人，就是董事長就讀臺大的同學，他是越南華僑，後來去美國定居，所以請他回來越南。」⁷²

還有一位必須一提的重要人物蟻團，其本身也是華人，曾經擔任胡志明市華運處主任、華人工作處主任、第五郡人民委員會主席、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委員以及國會代表，他在革新後擔任華人工作處書記兼主任長達二十餘年。革新初期，越南仍名列美國貿易禁運國家之一，而南部的胡志明市是當時吸引對外投資與發展國際貿易的重要城市，蟻團領導華人工作處逐步突破當時國際對越南的禁運，為胡志明市經濟發展中很重要的華人領導。⁷³1990年代初期，蟻團提到：「華人的經濟活動已恢復到解放前的二分之一，如果採取正確的政策，就會使華人發揮出極大的潛力。」⁷⁴蟻團此談話除了肯定革新後國家所採取的華人發展經濟路線之外，其實也是對華人過去與現在的經濟成

70. 潘正養，〈越南華人與台商間之發展型態與對越南經濟發展的影響〉，發表於「邁向新世紀：台灣與東南亞華人經濟發展與互動國際研討會」（臺北：僑務委員會主辦、台灣經濟研究院協辦，1998年4月13-14日），頁365-366。

71. 作者，當面訪談，VNGO012021，臺北市松菸文創園區，2021年9月19日。

72. 作者等，當面訪談，VHSERR1，胡志明市舊邑郡，2001年6月27日。

73. 〈不忘初心，革命老前輩弘揚正能量！〉，《西貢解放日報》，2018年7月26日，版2；〈蟻團同志，華人同胞的光輝榜樣〉，《西貢解放日報》，2020年11月4日，版1、4。

74. 僑務委員會，《越南華人經濟與投資環境》（臺北：僑務委員會，1993年），頁77。

就給予正面的評價。甚至為促進越南華商與臺商之間的經貿合作，華人工作處與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亦曾共同舉辦「越南華商與臺商經貿交流」等活動。⁷⁵ 華人工作處以及這些重要的華人幹部，不僅是政治任務的執行單位與推動者，在革新後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動能，是越南政府與海外華人資本橋接的重要制度因素之一。

伍、南向政策—臺越交往的政治遺產

由於 1960-1970 年代南越與臺灣雙邊政府於美援架構下展開密切合作，當時最大紡織廠即由我國趙耀東等紡織工業專家協助籌設建廠，南越廠商所使用的生產設備多來自臺灣，甚至在越戰後仍然是南越的生產主力。革新後，越南政府大力推動輕工業的民生物資生產製造，因此紡織、製鞋、食品等產業獲得發展，當地製造業不僅對我國機器的零組件需求殷切，甚至是探詢整廠設備輸出的供應可能。⁷⁶ 兩位在越南投資紡織廠的臺商說：「那我們會選擇在越南這邊投資，主要越南人口有八千多萬，另外就是在 75 年解放前，越南的紡織工業就已經有些基礎，像我們以前的趙耀東先生也在這邊主持一家紡織廠。」⁷⁷ 「臺灣以前在越南有兩個大投資廠，一個是趙耀東籌建的叫勝利紗廠，以前叫做越美紗廠。另外一個是立榮紡織，以前叫做中美紗廠，現在改成越勝紗廠。……我前三年跟十家越南國營廠，簽三年的合約，我幫忙買兩百多臺機器，還有整燙設計等機器，都是我幫他們建立成衣廠。」⁷⁸ 另外，1991 年臺灣新興紡織廠在獲得越南政府投資許可後，即進口 100 萬美元的設備；中興紡織則是向越南政府承租土

75.〈越南華商與台商經貿交流活動受理報名〉，《經濟日報》，1997 年 5 月 22 日，40 版。

76. 僑務委員會，《華僑經濟年鑑(1989)》，頁 350。

77. 作者等，當面訪談，VHTHUN1，同奈省仁澤工業區，2001 年 6 月 26 日。

78. 研究團隊，當面訪談，VHTVCS1，胡志明市富潤郡，2001 年 7 月 2 日。

地和廠房，利用引進臺灣舊縫衣機器進行加工生產。⁷⁹

1994年臺灣推動南向政策初期，隨行李登輝總統東南亞之行的總統府副秘書長戴瑞明也指出：⁸⁰「與東南亞各國的經貿合作協議，一方面是為我們自己創造機會，舉例而言現在臺灣沒人種甘蔗了，機器卻還閒置在那，如台糖想去印尼發展（結果後來去了越南），那裡的工人、土地都比較便宜，機器也能做更好運用。……其次，我們有許多人才、技術、資金的合作，比較重要的是技術合作，『臺灣經驗』是他們很想學習的。」⁸¹因此與硬體設備相關的臺灣經驗，也是越南革新後所欲學習的發展經驗，而「加工出口區」的臺越合作就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例子。

1960-1970年代，臺灣的高雄加工出口區向來是南越高層來臺交流的必訪之處，我國政府並受南越邀請前往進行考察。⁸²1974年，臺

⁷⁹僑務委員會，《越南華人經濟與投資環境》，頁79。

⁸⁰1994年2月9日，李登輝總統伉儷偕同外交部長錢復、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蕭萬長、總統府副秘書長戴瑞明、中國信託公司董事長辜濂松、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劉泰英及隨行人員，搭乘華航專機從桃園機場起飛，展開為期八天的菲律賓、印尼、泰國三國非正式訪問之旅。此行面會菲國總統羅慕斯、印尼總統蘇哈托、泰王蒲美蓬，堪稱經貿外交重大突破，也將南向政策推至最高點。正中書局編，《和平之旅：李總統登輝先生東南亞之行的意義與迴響》（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3、157。

⁸¹正中書局編，《和平之旅：李總統登輝先生東南亞之行的意義與迴響》，頁41-42。

⁸²中央通訊社，〈越副總理阮有固參觀高雄加工出口區〉，1967年1月24日，《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670124013500&IMG_SUB_ID=196701240135000001&page=1>；中央通訊社，〈越南國防部長阮文偉等抵高雄參觀訪問〉，1969年6月2日，《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

越雙方技術合作籌設西貢加工出口區簽約典禮，於高雄楠梓經濟部加工出口區會議室舉行。⁸³事實上，新順加工出口區一案，早於1974年我國政府即有意開發，後來則因南越局勢動盪而中止。⁸⁴越南能夠在革新開放初期很快地進行建設胡志明市加工出口區，很大原因就是1970年代的南越政府即已開始著手規劃相關投資建設，也因為與其合作國家均為臺灣，新順加工出口區的建設才能如此迅速地順利進行。筆者們曾造訪新順加工出口區，區內規劃完善、廠房整齊、道路寬敞，就連號誌、標線、路燈都與臺灣的設計造型一致，著實讓人有置身臺灣境內工業區的錯覺。

1990年代初期，臺灣在越南較重要投資，除了越盛、中央貿易開發、耀德公司（為籌建當時越南最高建物國際貿易辦公大樓）、中興紡織等公司之外，還有味丹與味王兩大食品廠。⁸⁵其中，味王公司早在1964年就進入南越西貢投資，主要生產販售味精和泡麵。⁸⁶1975

ID=19690602001500&IMG_SUB_ID=196906020015000001&page=1>；中央通訊社，〈越南參議院議長陳文林參觀加工區〉，1975年1月24日，《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750118010912&IMG_SUB_ID=197501180109120001&page=1>；國史館藏，〈台灣新聞報底片民國六十一年（五）〉，《台灣新聞報》，數位典藏號156-030110-0005-027；國史館藏，〈一九七二年吳梅邨赴亞歐美考察投資報告〉，《外交部》，數位典藏號020-089905-0003。

⁸³國史館藏，〈台灣新聞報底片民國六十三年（四）〉，《台灣新聞報》，數位典藏號156-030112-0004-002。

⁸⁴許文堂，〈台灣與越南關係十年來的回顧〉，蕭新煌主編，《台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研究中心，2003年），頁126。

⁸⁵越南通編輯委員會編，《越南通：產業分析手冊》（臺北：華信出版社，1993年），頁24-25。

⁸⁶楊雅民，〈新南向發燒這家公司到越南投資55年了〉，《自由時報》，

年之前，味王在南越即有數座廠房，包括生產味精、鹽酸、麵粉和樹脂等。1990年味王與越南國營糧食公司簽訂西貢味精廠合作案，而味王決定前往投資乃是因為越南政府允諾，將會歸還味王在戰後被沒收近六甲的土地。其間斡旋者為越南華人實業家陳城，陳城即為戰前味王與南越合資創辦天香味精廠之華商，他同時也是南越潮州幫僑領。⁸⁷1992年，西貢味王股份有限公司始正式成立，臺灣公司方面持股65%，其餘為越方股份，主要營業項目仍是味精和泡麵之製造及銷售。⁸⁸

1994年，當時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建會主任委員的蕭萬長，不諱言地指出南向政策具有經濟和政治效益，在推動南向政策的具體做法上特別提到：「可結合東南亞華裔人士之力量，運用華人在當地的政經關係與影響力，推動南向政策。」⁸⁹暫且不論東南亞各國華人實際的經濟地位如何，「與當地華人或華商合作」一直是我國政府進行對外經貿活動所採取的主要策略，而這與我國長期的僑務政策有著密切關係，也是政策路徑依存的一種表現形式。事實上，亦如潘正養的看法，越南華人的確在早期臺灣與越南雙邊經貿交往中發揮極大的作用。

2019年9月9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10554>>。

⁸⁷僑務委員會，《華僑經濟年鑑(1989)》，頁353；僑務委員會，《華僑經濟年鑑(1990)》，（臺北：僑務委員會，1990年），頁379；〈我國民營企業在東南亞投資的現況與遠景（上）〉，《經濟日報》，1974年1月21日，06版；〈陷越資產可望索回〉，《聯合報》，1990年8月27日，09版；〈續寫先賢輝煌歷史：萬盛發集團獨資贊助改建安平醫院全部經費（上）〉，《西貢解放日報》，2018年6月19日，版2。

⁸⁸味王股份有限公司，《味王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年年度年報》，2002年6月27日，《味王》，<http://www.vewong.com/ecmas0069/store/F4/ANN_REP_2001.pdf>。

⁸⁹彭百顯編，《南向政策與台灣經濟未來》（臺北：財團法人新社會基金會，1995年），頁159。

陸、結語

本文所討論跨國資本的路徑依存，指的是冷戰體制下臺越關係的歷史遺緒，以及臺灣僑務政策的治理思維與南越華人的經濟地位。而南越華人的經濟作用有三個意涵：一是南部（胡志明市及其周邊）異於北部的政治經濟結構，形塑南越華人具有開放性的世界主義性格；二是西貢華人於南越時期的重要經濟地位，掌握多數工商業經濟；三是革新後華人工作處所扮演的積極角色，成功橋接了與海外華人資本的聯繫。在本文研究臺灣南向政策對越南投資的討論中，臺商跨國資本並非如古典經濟學所言理性經濟人那般，假設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幾乎不受社會關係所影響，其仍受限於國際政治局勢與投資國地方脈絡的特殊性和多樣性。

冷戰體制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以美蘇為首的政治外交對抗，美援架構更形塑了 1960-1970 年代臺灣與南越雙邊緊密的經濟與社會交往，也由於臺灣僑務政策的治理思維以及南越華人的經濟地位，這些國際政經結構與華人制度因素，均成為臺越交往的政治遺產。這也是為什麼在 1986 年底越南決議採行革新開放政策之際，全世界僅有臺灣商人積極前往越南考察投資，而且投資規模與金額至今名列前茅。從歷史演進來看，受南向政策鼓勵前往越南投資的臺灣國營企業、國民黨黨營事業和民間企業，很多是在越南革新開放以前就已經有南越經驗，「革新與南向」因勢利導從而接連起臺灣與越南間失落的十年。

2016 年 5 月，蔡英文總統於就職演說中兩度提及「新南向政策」，其論述脈絡分別是在「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區域的和平穩定發展及兩岸關係」兩個層面。依據其演說內容，新南向政策的推動是為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和多元性，擺脫過於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進一步擴大與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科技、文化與經貿交流合作，與區

域內國家共享資源、人才與市場以求擴大經濟規模資源有效利用。⁹⁰由此可知，新南向政策並非捨棄過去南向政策的政治經濟導向思維，而是一方面延續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可能產生的經貿風險，另一方面則是開拓全面性的經濟社會合作。因此，2016 年提出的「新南向政策」之於過去的「南向政策」，不僅承繼了區域和平發展與兩岸關係的對話框架，也有開創因應全球變局的多元合作議題。我國政府在推動具體計畫部分，涵蓋了經貿、農業、醫療、觀光、防災、電子商務、工程和教育等諸多議題的合作項目。⁹¹

自 1950 年代冷戰局勢漸起，對外經貿投資與農業技術推廣向來是我國拓展外交關係的戰略優勢；1990 年代臺灣所推動的南向政策在越南一地成績斐然，如此的經濟成就相當程度是得益於 1960-1970 年代冷戰架構下的臺越交往。2016 年倡議的新南向政策除了經貿合作之外，「以人為本」的多元交流議程被視為是南向新政的主軸。⁹²在人才培育相關計畫的推動中，透過各種獎學金的設置以及廣設專班吸引越南學生來臺學習就讀可說是最具成效的政策之一。過去，來自馬來西亞的外籍學生一直是我國大專院校人數最多的外國學生，但在 108 學年度越南籍學生人數（17,421 人）首度超越馬來西亞籍（15,741 人）躍升首位。⁹³如同前文提到，1960-1970 年代南越華人經濟地位及

⁹⁰中華民國總統府，〈中華民國 14 任總統蔡英文女士就職演說〉，2016 年 5 月 20 日，《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444>>。

⁹¹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新南向政策：新力量、新方向〉，2017 年 10 月 6 日，《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https://www.ey.gov.tw/otn/878F2C1AE56B71D3>>。

⁹²楊昊，〈檢視臺灣的新南向政策：議程、網絡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 56 卷第 1 期，2017 年 3 月，頁 128。

⁹³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各年度大專校院境外學生在臺留學 / 研習人數統計表〉，2021 年 2 月 20 日，《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其歷史制度因素，成爲了後來南向政策的路徑依存脈絡，這群越南留臺生未來也可能扮演著臺灣與越南雙邊發展中很重要的社會資本網絡。

(收件：2021年10月12日；修正：2022年1月14日；採用：2022年1月20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館經濟參事處，1962。《越南投資參考資料》。西貢：中華民國駐越南大使館。
- 王宏仁，2019。《全球生產壓力鏈：越南台商、工人與國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正中書局編，1994。《和平之旅：李總統登輝先生東南亞之行的意義與迴響》。臺北：正中書局。
- 唐向宇，2014。《南越第一共和國興亡史：越南戰爭序曲》。臺北：獨立作家。
- 海外出版社編，1970。《越南華僑與華裔》。臺北：海外出版社。
- 張文和，1975。《越南華僑史話》。臺北：黎明文化事業。
- 郭壽華編，1966。《越、寮、柬三國通鑑》。臺北：自行出版。
- 郭壽華編，1970。《越南通鑑》。臺北：幼獅書店。
- 彭百顯編，1995。《南向政策與台灣經濟未來》。臺北：財團法人新社會基金會。
- 越南通編輯委員會編，1993。《越南通：產業分析手冊》。臺北：華信出版社。
- 僑務委員會，1989。《華僑經濟年鑑(1989)》。臺北：僑務委員會。
- 僑務委員會，1990。《華僑經濟年鑑(1990)》。臺北：僑務委員會。
- 僑務委員會，1992。《光輝的軌跡：僑務委員會六十週年會慶實錄》。臺北：僑務委員會。
- 僑務委員會，1993。《越南華人經濟與投資環境》。臺北：僑務委員會。
- 劉為安，2016。《堤岸今昔》。胡志明市：市文化文藝出版社。

- 潘朝英、賴丹尼，1966。《越南危機》。臺北：徵信新聞報。
- 顧長永，2001。《台商在東南亞：台灣移民海外的第三波》。高雄：麗文文化公司。
- 龔宜君，2005。《出路：台商在東南亞的社會形構》。臺北：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專書譯著

- Latham, Michael E. 著，牛可譯，2003。《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白石昌也著，吳瑞雲、田川雅子譯，1994。《越南：革命與建設之間》(東アジアの国家と社会：ベトナム)。臺北：月旦。
- 阮高祺著，陸宗璇譯，1977。《二十年零二十天：空軍元帥阮高祺回憶錄》(*Twenty Year and Twenty Days: Nguyen Cao Ky*)。臺北：開源出版事業。
- 梅李廣編，吳彩瓊譯，2004。《越南全景》(*Việt Nam toàn cảnh*)。河內：世界出版社。
- 窪田光純著，林雅倩譯，1997。《躍動的國家：越南》(躍動する国ベトナム)。臺北：大展出版社。

專書論文

- 王宏仁，2009。〈性別化的草根跨國社區：以台越關係為例〉，王宏仁、郭佩宜編，《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臺北：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163-191。
- 作者不詳，1963。〈越南工業的今昔：越南紡織廠簡介〉，施達志編，《華裔在越南》。堤岸：統一書局，頁 6-7。
- 何邦立，2015。〈何宜武華僑經濟五十年〉，何邦立、汪忠甲編，

- 《何宜武與華僑經濟》。臺北：華僑協會總會，頁 98-176。
- 何宜武，2015。〈奉命籌辦世華聯合商業銀行〉，何邦立、汪忠甲編，《何宜武與華僑經濟》。臺北：華僑協會總會，頁 74-79。
- 梁錦文，2001。〈1990 年代越南與我國關係之分析〉，許文堂主編，《越南、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轉變》。臺北：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183-217。
- 許文堂，2003。〈台灣與越南關係十年來的回顧〉，蕭新煌主編，《台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研究中心，頁 117-161。
- 許文堂，2013。〈台灣與越南雙邊關係的回顧與分析〉，施正鋒主編，《崛起中的越南》。臺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頁 1-46。
- 許文堂，2014。〈越南華人公民地位的變遷〉，陳鴻瑜主編，《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臺北：華僑協會總會，頁 147-171。
- 褚廷福，2014。〈越南華人之公民地位 (1986-2011)〉，陳鴻瑜主編，《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臺北：華僑協會總會，頁 173-199。
- 潘正養，2011。〈播種者丁善理先生〉，嚴慧玲主編，《謹把這裡作故鄉：對故丁董事長善理先生的回憶》。臺北：中央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頁 27-37。

期刊論文

- 莫 唐，1996/1。〈胡志明市華人經濟的發展〉，《八桂僑刊》（南寧），1996 年第 1 期（總第 29 期），頁 59-63。
- 黃奎博、周容卉，2014/8。〈我國「南向政策」之回顧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2 卷第 8 期，頁 61-69。
- 楊 昊，2017/3。〈檢視臺灣的新南向政策：議程、網絡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 56 卷第 1 期，頁 123-143。

龔宜君，2010/12。〈「佔名」關係：台商與越南女性的親密關係形構〉，《臺灣社會學刊》，第45期，頁213-247。

研討會論文

潘正養，1998/4/13-14。〈越南華人與台商間之發展型態與對越南經濟發展的影響〉，「邁向新世紀：台灣與東南亞華人經濟發展與互動國際研討會」。臺北：僑務委員會主辦、臺灣經濟研究院協辦，頁362-368。

檔案資料

國史館藏，〈一九七二年吳梅邨赴亞歐美考察投資報告〉，《外交部》，數位典藏號 020-089905-0003。

國史館藏，〈中華民國赴越南經濟訪問團訪問經過報告書〉，《陳誠副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 008-010601-00014-001。

國史館藏，〈中越合作會議（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數位典藏號 040-010500-0108。

國史館藏，〈中越經濟合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數位典藏號 040-010600-0049。

國史館藏，〈台灣新聞報底片民國六十一年（五）〉，《台灣新聞報》，數位典藏號 156-030110-0005-027。

國史館藏，〈台灣新聞報底片民國六十三年（四）〉，《台灣新聞報》，數位典藏號 156-030112-0004-002。

國史館藏，〈任行政院長時：越南中央行政委員會主席阮高奇訪華〉，《嚴家淦總統文物》，數位典藏號 006-010604-00002-014。

研究計畫

陳東升、周素卿、曾嬾芬、龔宜君，2001。《地域網絡與族群關係：

東南亞台商的研究（計畫編號：90-2420-H-002-011-SC）》。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

報紙

- 1974/1/21。〈我國民營企業在東南亞投資的現況與遠景（上）〉，
《經濟日報》，06 版。
- 1990/8/27。〈陷越資產可望索回〉，《聯合報》，09 版。
- 1997/5/22。〈越南華商與臺商經貿交流活動受理報名〉，《經濟日
報》，40 版。
- 2018/6/19。〈續寫先賢輝煌歷史：萬盛發集團獨資贊助改建安平醫
院全部經費（上）〉，《西貢解放日報》，版 2。
- 2018/7/26。〈不忘初心，革命老前輩弘揚正能量！〉，《西貢解放
日報》，版 2。
- 2019/4/21。〈華運武裝力量聯絡組聚會〉，《西貢解放日報》，版
2。
- 2020/11/4。〈蟻團同志，華人同胞的光輝榜樣〉，《西貢解放日
報》，版 1、4。
- 2020/12/9。〈華運在抗美救國事業中貢獻良多〉，《西貢解放日
報》，版 1。
- 梁鴻德，2018/2/10。〈華運力量戊申春季總進攻與起義及建設與捍
衛祖國的貢獻〉，《西貢解放日報》，版 2。

雜誌

- 蔡育文，2018/3。〈台糖公司砂糖產業南向軌跡（上）〉，《台糖通
訊》，第 2072 號第 142 卷第 2 期，頁 32-37。

網際網路

- 中央通訊社，1960/9/20。〈越南政府外援運用局長武文泰來臺〉，

《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600920005800&IMG_SUB_ID=196009200058000001&page=1>。

中央通訊社，1960/12/12。〈出席中越經濟合作會議代表李國鼎（左）和長蔣彥士（右）啓程〉，《中央通訊社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https://cnaphoto.culture.tw/home/zh-tw/CulturePic_50/316109>。

中央通訊社，1967/1/24。〈越副總理阮有固參觀高雄加工出口區〉，《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670124013500&IMG_SUB_ID=196701240135000001&page=1>。

中央通訊社，1969/6/2。〈越南國防部長阮文偉等抵高雄參觀訪問〉，《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690602001500&IMG_SUB_ID=196906020015000001&page=1>。

中央通訊社，1971/9/15。〈第七屆中越經濟合作會議閉幕並簽署聯合公報〉，《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710915009400&IMG_SUB_ID=197109150094000001&page=1>。

中央通訊社，1974/11/26。〈第九屆中、越經濟合作職官級會議在經濟部舉行〉，《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741126014002&IMG_SUB_ID=197411260140020001&page=1>。

中央通訊社，1975/1/24。〈越南參議院議長陳文林參觀加工區〉，《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19750118010912&IMG_SUB_ID=197501180109120001&page=1>。

中央通訊社，2022/2/17（檢索）。〈台美合作回憶美援物資抵台〉，《中央通訊社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https://cnaphoto.culture.tw/home/zh-tw/EventStory_01>。

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5/20。〈中華民國第 14 任總統蔡英文女士就職演說〉，《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444>>。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2017/10/6。〈新南向政策：新力量、新方向〉，《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https://www.ey.gov.tw/otn/878F2C1AE56B71D3>>。

宋秉忠，2007/3。〈貿易門戶敞開後，經濟力正崛起、消費力已抬頭越南機會財還剩多少？〉，《遠見》，第 249 期，《遠見》，<<https://www.gvm.com.tw/article/11588>>。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2002/6/27。《味王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年年度年報》，《味王》，<http://www.vewong.com/ecmas0069/store/F4/ANN_REP_2001.pdf>。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21/2/20。〈各年度大專校院境外學生在臺留學 / 研習人數統計表〉，《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_Content.aspx?n=E629CC6F403F7402&sms=F42C4CEA6ED95269&s=1DFFB3B78ADF0E40>。

楊雅民，2019/9/9。〈新南向發燒這家公司到越南投資 55 年了〉，《自由時報》，<<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10554>>。

訪談資料

研究團隊，2001/7/2。當面訪談，VHTVCS1，胡志明市富潤郡。

作者，2021/9/19。當面訪談，VNGO012021，臺北市松菸文創園區。

作者，2020/11/12。當面訪談，VNNTS012020，臺北市臺商公司。

作者等，2001/6/26。當面訪談，VHTHUN1，同奈省仁澤工業區。

作者等，2001/6/27。當面訪談，VHSERR1，胡志明市舊邑郡。

作者等，2001/6/29。當面訪談，VHOTAT1，胡志明市第七郡新順工業區。

英文部分

專書

Bùi, Huy Nhuông, 2010. *FDI Disbursement in Việt Nam*. Hà Nội: Gioi Pub.

Đặng, Thị Loan, Lê Du Phong, & Hoàng Văn Hoa, 2010. *Việt Nam's Economy after 20 Years of Renewal (1986-2006):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Hà Nội: Gioi Pub.

North, Douglass C., 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ran, Khanh, 1993. *The Ethnic Chine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專書論文

Giroud, Axèle, 200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Rise of 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in Nick J. Freeman & Frank L. Bartels, eds., *The Futur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pp. 104-124.

Hsing, Y., 2004. "Blood, Thicker than Wa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Southern China," in Trevor J. Barnes, Jamie Peck, Eric Sheppard, & Adam Tickell, eds., *Reading Economic Geograph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pp. 362-374.

Machado, Kit G., 2003. "Japanese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 and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East Asia: Linkag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Jomo K. S. & Brian C. Folk, eds., *Ethnic Business: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pp. 213-236.
- Malmberg, Anders & Peter Maskell, 2010.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Localized Learning and Spatial Clustering,” in Ron Boschma & Ron Martin, eds.,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p. 391-405.
- Sewell, William H., 1996.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errance J.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245-280.
- Tran, Khanh, 1997. “Ethnic Chinese in Vietnam and their Identity,”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267-292.
- Vu, Quoc Tuan & Nguyen Dinh Cung, 2003. “Development Various Types of Enterprises,” in Dinh Van An, ed.,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oriented Market Economy in Vietnam*. Hà Nội: The Statistical Publisher. pp. 8-54.

期刊論文

- Freeman, Donald B., 1996/4. “Doi Moi Policy and the Small-enterprise Boom in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86, No. 2, pp. 178-197.
- Granovetter, Mark, 1985/11.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pp. 481-510.

Martin, Ron & Peter Sunley, 2006/8.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6, No. 4, pp. 395-437.

Pierson, Paul, 2000/6.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pp. 251-267.

The Cold War, Renovation, and the Southbound Policy: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aiwan's Transnational Capital in Vietnam

Shu-ming Chang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I-chun K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rrent economic achievements of Taiwan's transnational capital in Vietnam reflect the U.S. aid structure of the Cold War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the special local conditions in South Vietnam. In this article,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 refers to the governance thinking of Taiwan's policy towar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nd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Vietnam.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Chinese comports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southern part of Vietnam has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an North Vietnam, and has an open cosmopolitan character. Second, the Chinese in Saigon during the South Vietnam period dominated most of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Third is the active role played by the Ethnic Chinese Office of Vietnam after the renovation, which successfully connected with overseas Chinese capital.

Keywords: Taiwan, Vietnam, Cold War, Renovation (Doi Moi), Southbound Policy